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8期聚焦

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 吕红娟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尤其需要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干部。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懈怠心理和为官不为现象，为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区分”，李克强总理也明确提出要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如何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从制度层面保护敢于担当且能担当的干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8期“本刊策划”栏目聚焦“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邀请学者和官员对容错免责的边界与尺度、容错与问责的关系、怎样为担当者担当、如何推进容错机制的法治化、容错与用人的关系、党内纠错机制等议题进行探讨。同时，我们特别组织了中央党校部分县委书记学员进行座谈交流。此外，还对一些地方出台的有关容错纠错机制的文件进行了梳理分析。

如何避免免责成为违法乱纪的保护伞，同时保护干部积极性？这是建立容错机制的首要问题。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育长梅丽红教授从三个方面指出了容错免责的边界：容为公之失，不赦为私之罪；容敢干事之误，不纵“乱作为”之错；容突破“过时”之规，不免明令禁止之责。同时，她还强调：容错免责，不能忽略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通过明晰“鼓励支持什么”与“反对禁止什么”的制度和政策导向，实现正向激励与反向鞭策的相互配合，从严治党与改革创新的高度统一，真正跳出“管严不作为、管松乱作为”的怪圈。

问责和容错的关系是什么？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无论是问责制还是容错机制，本质上都是提高权力运行效能的制度措施。只不过问责制是通过防止权力出错的角度“保证权力运行的效能”，而容错机制则是从鼓励权力改革创新的角度“提高权力运行的效能”，二者的制度目标是一致的。问责与容错，从防止权力懈怠和激励权力活力，规范权力运行和提高权力效能两个方面，保证了政府工作的质量，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为什么要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为什么样的人担当？怎样为敢于担当者而担当？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撰文强调，为了确保有人敢担当、为敢担当者而担当，必须在体制机制上予以保障，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做敢于担当者的坚强后盾。

怎样推进容错机制法治化？容错机制的适用风险之一就是与决策追责制的矛盾冲突。管控（规避）容错机制的适用风险，比较可靠的路径是实现“容错机制法治化”。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郎佩娟认为，容错机制法治化要立法先行。容错机制立法，首要任务是划定容错机制的适用范围，而容错机制的适用范围的划定可以参考我国现行立法例，可以采用肯定列举和否定列举的立法技术，规定决策失误免责条款和追责条款。

如何通过建立容错机制，克服干部不作为中的用人机制问题？山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丰存斌指出，推动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解决干部不作为问题，必须提升容错机制的科学性，防止容错变成“错容”，变成问题干部的“避风港”。必须厘清是非，划定底线，有效防止“错容”导致评价失准、用人失误。

如何健全党的纠错机制？健全党的纠错机制，一方面要从思想、组织、作风上锻炼提升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纠错能力；另一方面要从党的制度建设上，建设一个充分发挥执政功能并能防错纠错的先进性的党。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吕品指出，党的纠错机制具有事后作用性、运行系统性、复杂性、主动性等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健全监督制度是建立完善党内纠错机制的四个基本要求。

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们怎样看待容错纠错机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与中央党校部分第7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就容错纠错相关问题进行了座谈。学员们从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意义到具体的容错情形，从容何错到如何容错，从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原则和要求到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的方面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学员们普遍认为，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在当前对鼓励干部敢于作为、积极作为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中，还需根据具体情况对制度进行细化完善。

各地是如何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我们从各地出台相关文件的基本情况、目的、具体容错及追责情形、免责程序和处理、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需要完善哪些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分析。

报刊聚焦

用典释义

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

【讲话原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按照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古人说：“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要适应这个大趋势。总体上说，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应该也能够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出处】

故曰：“其出弥远者，其智弥少。”此言智周乎远，则所遗在近也。是以圣人无常行也。能并智，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视，故曰：“不见而明。”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

——（战国）韩非子《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

【解读】

《韩非子·喻老》是法家经典《韩非子》为道家经典《老子》作阐释的篇章。本节内容是解释《老子》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是对老子“不为而成”的阐释。意思是，根据时机来办事，依靠条件来立功，利用万物的特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获利，所以说“不妄为而可以有所成就”。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语，意在鼓励网信事业因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和大趋势，借势而起，乘势而发，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杨立新）

大漠天苍献年华 以身许国逐紫烟

——两弹元勋陈能宽的读书与科研

□ 王建柱

金银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上，和平鸽在上空久久盘旋。如今，完成了化剑为犁历史变迁的中国原子城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草长莺飞，牛羊成群。

陈能宽很怀念这个地方。

为报效中华而学

1923年5月，陈能宽出生于慈利县江垭镇一个山沟里。青少年时期饱尝了民族危亡的耻辱，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不断地激励着陈能宽的热血。他立志要找一条“救国之道”。他拼命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

陈能宽在常德隽新中学度过了令人怀恋的初中时光。他对几何学十分着迷，受到该校一位几何老师的很大影响，为他日后进行金属结构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1939年初中毕业后，他以最高总分考取有奖学金的长沙内迁沅陵的雅礼中学。高中期间，他的英语和理科成绩都很好，1942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即唐山交通大学）矿冶工程系学习。

1946年大学毕业后，陈能宽到天津炼钢厂当分析员。这是一个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的大厂，但当时的工厂烟囱不冒烟，面对这样萧条落后的工业，陈能宽不免黯然神伤。那年，出国留学考试刚好恢复，他和妻子裴明丽考取了有政府支持的自费留学，抱着“救我中华”的热切愿望，于1947年到美国深造。

旅居美国期间，他借助奖学金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先受聘于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后又到匹兹堡的西屋电器公司作研究员。在美国工作的几年间，陈能宽很快成长为颇有成就的年轻科学家。

正当他学成准备回国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他有国难回。直到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他才真正有了归国的希望。



有些美国朋友对他急于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不解，他的耶鲁大学同学、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麦登执意挽留：“你一走，我将失去一位优秀的合作者。美国也将失去一个特殊的人才。美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这么好，你非走不可吗？新中国那样穷困！”陈能宽的回答是：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

1955年12月，终于实现了回国愿望，他没有忘记自己年少时曾许下“知识报国”的宏愿。

为特殊使命“隐”25年

陈能宽和同时期回来的归国学者在中南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欢迎。沉浸在幸福感中的陈能宽无法意料，他的人生之路将很快迎来一次重大的转折与挑战。

1960年6月，他被任命为当时的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这个神秘单位负责的正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任务。新的职责要求陈能宽放弃原先的金属物理学专业，转为原子弹爆轰专业。虽然这个领域对他来说还算不上一张白纸，但也十分陌生。

他对当年李觉、钱三强、朱光亚等专家同他首次会面时的情形记忆犹新：“让我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你们是不是调错了人？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我搞过单晶体，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啊！”

李觉的回答让陈能宽血脉愤张心跳加速：“我们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人家说我们几十年也休想把原子弹造出来，我们应当有志气。”

从此刻开始，陈能宽开始隐姓埋名。他在国际学术界与中国科技界销声匿迹达25年之久，甚至连妻子对他的工作性质和具体地址也一无所知。对她来说，那只是一个抽象的信箱号码。几年中，陈能宽从一个信箱“走”到另一个信箱，带着他的梦想和诗情，带着雷管和炸药。

其实，陈能宽何尝不知道他经常面临的危险和艰辛，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你要想得开。当年我们抛弃洋房、轿车，带着儿女回国，正是为了干一番事业，让祖国富强。”

从“门外汉”到两弹元勋

隔行如隔山，陈能宽付出了多少努力可想而知。“我连炸药是什么东西都没看到过，什么叫炸药，行业里面叫作黑素今，什么TNT，不知道，雷管，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雷管，都没碰到过。”就这样，陈能宽边学边做，带领团队在北京远郊的古长城下，开始了原子弹研制中的“爆轰”物理实验。科学有时真的很容易让人入魔似的着迷。“到了晚上不能睡觉，都得想。有时候看到这个长城外面的那个山都好像那个波形，总是一高一低的，不像海平面很平。”

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落后。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技术，研制耗费巨资的核武器，谈何容易。多年后，陈能宽常与熟人开玩笑，“没有计算机，有时就使用算盘，原来我们老祖宗发明的算盘，还可以解决尖端武器所要的问题么”。1962年9月，在陈能宽带领下的攻关队伍，终于在化工技术、聚合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和相应实验测试技术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切在共和国科技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长城脚下的试验场已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需要了。1963年初，陈能宽又率领一支更大却同样年轻的攻关队伍进军青海，向更高的台阶冲刺。在陈能宽直接参与领导下，相继取得了为进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爆试验所必不可少的有决定性意义的多个成果。

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装配出来，通过专列运送到了马兰核试验基地。西北戈壁的试验基地，每个人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和期待，大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默默传递着这种心情。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罗布泊试验基地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电钮，十秒钟后，强光一闪，火球迸放，随着隆隆的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震彻大地的东方巨响，向世界昭示着中国国防科技的又一次腾飞，此时的实验基地现场一片欢腾。陈能宽百感交集，想说的话很多，但说不出来。事后，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形容当时的情形：东方巨响，大漠天苍，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陈能宽马上投身原子弹武器化和氢弹的攻关中。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时，陈能宽是试验现场的总负责人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集中了大量精力参与到核试验爆炸方式的转变工作之中。

1982年，由他参与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得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1986年，他同邓稼先一起，作为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领奖代表，登上主席台，接受了国家的最高奖励。

朋友们说，陈能宽的好学可能与他的名字有关，宽阔，所以海纳百川，更有人为他写下这样一副藏头联：能容天下事，宽待天下人。

链　接

陈能宽，优秀共产党员，“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60年奉调参加原子弹、氢弹研制，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之一，主持并取得一系列核装置理论、工程和实（试）验上的重大突破，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及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1987年被聘为863计划某领域的首届首席科学家，带领我国相关高技术研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2016年5月27日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名家治学

西方“中国叙事”的迷失

□ 于　滨

西方看中国：幻觉与错觉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为何久盛不衰？为何西方有些人对华的幻想与幻觉中除了梦寐以求的市场和挥之不去的黄祸以外鲜有对华的平视、平等和平常心态？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潘成鑫教授在其近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简称《中国叙事》）一书中，对西方这种类似精神分裂型的对华观念，进行了深刻、系统和独特的解析。

该书的基本论点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表述，与其说是对真正的中国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基于西方自身社会话语中的所谓“自传性”。西方集体潜意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它无时无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识和观念对理性和知识的追求。具体说，就是“欲望助长了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的渴望，而后者又反过来为欲望提供合理性，助力于欲望的实现”。最终，“知识丧失其貌似的纯真，显露出与权力的纽带关系”。由于中国在西方认知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西方的“中国叙事”中，常常出现中国“威胁”和中国“机遇”这两种南辕北辙观念的共生状态。

《中国叙事》一书对西方的理论和理念不是一味的拒绝或简单的批判，而是从西人的思维方式、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加以剥离和考证。虽然此书属政治学类，但却涉及哲学、历史、文化、人类学、科学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众多学科，涉猎面极广；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环环紧扣。几年前笔者第一次读《中国叙事》的英文版时，感觉有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风格。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其实是对西方学界中的强势的学术种族主义悲情式的抗议和无奈的咏叹调之混合体，对于西方学界的傲慢与偏见，萨伊德的手段是彻底毁之而后快。相比之下，《中国叙事》则是以西式“工具”，对其进行CT式扫描或外科手术式的解析；它以西人熟悉的思维结构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读者引入一个他们自认为是理性、科学、并占有道德制高点但实际却是非理性非科学欠道德的“混沌”之地，迫使西人直视其理性中之非理性成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叙事》比《东方主义》更胜一筹。

《中国叙事》的“世界”版

一个一直困扰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突飞猛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又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联不大，或风马牛不相及。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学泰斗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点的同年，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知名教授亚历山大·乔治出版了一本《填补鸿沟》的专著，力图把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美国外交的实践相结合，却难有回天之力。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大旗，现实派也开发出乐观的“单极稳定论”和悲观的“文明冲突论”，与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论”的延伸“历史终结论”遥相呼应。与此同时，所谓建构主义也在九十年代异军突起，扩展迅速。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蒸蒸日上，对国际时局的了解、判断和把握却屡屡失误，对外政策中频频诉诸武力，以至美国基辛格在“9·11”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除了军事政策以外，已无外交而言。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怪像：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的高度发达，大师级人物（亨廷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福山等）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国际间的乱象与西方热衷的所谓“全球治理”的理念却渐行渐远，西方“赢得战争，输掉和平”的幽灵欲在世界范围重现。

试问，如此辉煌的理论与西方治下的乱世有何连带关系？众多的大师级战略家们对西方理论界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有何评说？也许这就是西方对崛起的中国之叙事的国际版吧。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对非西方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恐惧，尤其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缺少外在敌人而导致的认同危机，建构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原动力。亨廷顿以后，美国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又繁衍出所谓“进攻型现实主义”，完全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将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交往视为你死我活的惨局。

窥见中国版的“中国叙事”和“世界叙事”

为何中国不但可以在纷乱的世界中独善其身，而且日益崛起？原因之一是中国不仅坚持了独立、自主和主权，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策层面告别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极端成分，对各类“舶来品”采取兼容并取、以我为主的更开放、更务实的发展战略，同时避免了全局性的震荡或失误。

尽管这一过程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为占世界人口1/5的巨大群体所带来的，却是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持久的安定和繁荣。中国有理由为自身的成就感到自豪，更要对现存的问题和挑战保持清醒头脑，以更自信、更积极、更务实、更包容的姿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国际化和中国化之间寻找自我并造福世界。

对于国门内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目标不仅是要以“原创性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以清晰地解读中国”，也不必回避以中国的话语和理论解读世界的使命，即中国的崛起肯定是一劳永逸地终止了西方对中国的统治；但崛起的中国并不需要也不寻求终止西方本身。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共存共荣不仅是基于中国的利益，更是“和而不同”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自然延伸。

一个非西方、非基督教、非西式民主制度、非结盟的、世俗的和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军事力量的中国，已经在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中稳步崛起。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与一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共存，而西方仍然跳不出其理论大师挖掘的“文明冲突”的陷阱。在人类拥有超强毁灭对方和自身的能力的时代，此类“文明冲突”论其实是不文明非文明和反文明势力之间的冲突。

书而思